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五辑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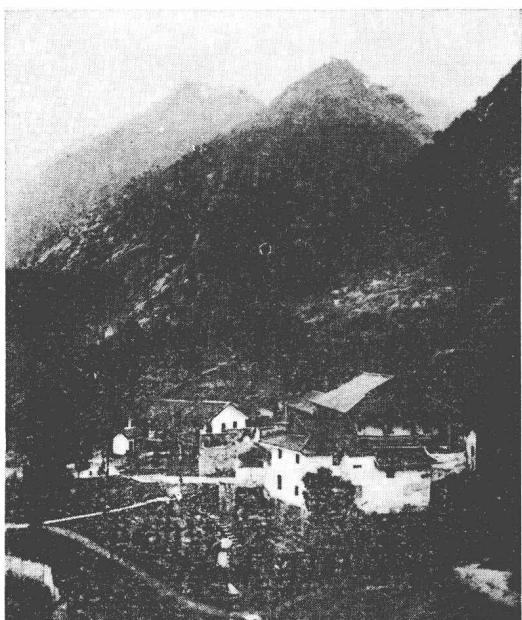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7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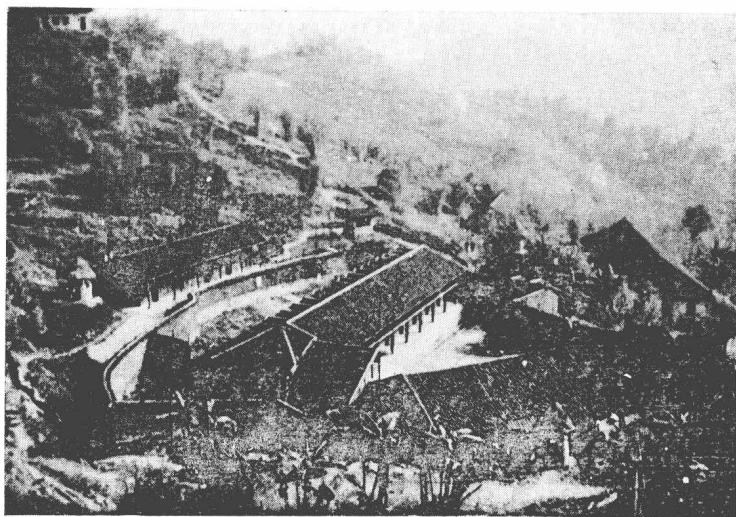


重庆“一一·二七”烈士纪念碑

重庆中美合作所
“白公馆”监狱
旧址



重庆中美合作所
“渣滓洞”监狱
旧址



陆定一同志抄录“一一·二七”艾文宣烈士遗诗手迹
(一九八二年四月)

中國人民流
着鮮血寫的
帳篷搭起一
塊堅硬的
盾牌

1927年4月

一九八二年四月

陸定一書



从松林坡刑场大尸坑中挖出的烈士遗体



革命烈士遗体

大屠杀时冲出渣滓洞监狱牢房后被敌人杀害的部分

目 录

重庆工作的回顾.....	吴玉章(1)
在张友渔同志身边工作	程 文(18)
在“六一”大逮捕的日子里	王志祥(34)
渣滓洞集中营回忆录	唐弘仁(61)
中美合作所“一一·二七”大屠杀	“一一·二七”大屠杀在渝部分脱险同志(87)
重庆“四·二一”学运见闻	杨世元(120)
解放前夕重庆金融崩溃琐记	何兆青 马绍周 赵世厚(148)
我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的工作和见闻	刘宗宽(168)

订正·质疑·补充

对《“六一”大逮捕的前前后后》一文

的重要更正.....	本刊编辑部(198)
丁涪海同志来信(摘要).....	(198)
吴厚安同志来信(摘要).....	(200)
禾 波同志来信(摘要).....	(200)
夏 涌同志来信(摘要).....	(202)
兰国农同志来信(摘要).....	(204)

《“六一”大逮捕的前前后后》一文

颇多失实.....	杨敬年(206)
关于《较场口血案幕后见闻》的订正.....	胡牧国(213)

重庆工作的回顾

吴玉章

本文是中共重庆办事处一九四七年三月胜利撤返延安之后，吴玉章同志就中共四川省委一九四六年四月在重庆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原题《在重庆工作的概况》，由吴玉章同志口述，邵子南同志笔记。现谨摘登部分，以飨读者。

这是一篇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刊出之前，经原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审阅。编者只对个别文字和标点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调整，并加了注释。

编 者

一、外部环境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开始筹备，四月二十二日，董老同志和我们开会，宣布正式成立（但尚未公开）。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离渝之前的最后一次招待新闻记者会上正式公开，介绍了我是正书记，王维舟同志是副书记，给大家见面。省委公开后，我同王老各处拜客，所有党政军民机关、民主人士方面，应该去的都去了，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搬家，要人纷纷离开重庆，我们的代表团也准备搬家。重心转移了估计可能有重大变化，重庆要变为次要的地方了，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地方工作，特别是报馆工作；同时报纸^①也要变为地

① 《新华日报》——编者

方报了。省委公开之初，国民党并未重视。国民党的官吏，行营主任张群来来去去的，只有张笃伦常在（时以重庆市长代理行营主任），我们和他拉得很好，请客，我们请他们，他们也请我们。

当时（五月）四平街战斗激烈，我军在那儿坚决抵抗，尤其十八、九号那几天，表现我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许多人都以为我们能固守。后来四平街我军撤退，紧接着，公主岭撤退，长春撤退，撤退得很快，许多人又替我们耽心，以为我们不行。五月二十三日，那天下大雨，我感觉重庆的革命空气要消沉下去了，找王老商量，要洪沛然出去动员民主人士开一个要求和平的座谈会，利用那时罗隆基等尚未走的时机（邓初民、史良等都在），要他们在座谈会上讲一讲话，并发表一个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二十六日会就开了，罗隆基、邓初民、史良等都讲了话，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八九十人。当时《宣言》没有发表，是想争取更多的人签名，打算等到六月十日才发。殊知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在二十九日就先发表了，而其他各报均未送去。这个运动这次没有作好。但，这时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空气在广大人民中还是非常浓厚，需要重搞。于是，重新布置，全体动员。这一次，重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都起来了，签名的就有三千多人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这个运动于我们有利，也是适合群众的要求。实业界、银行界都参加，而且由他们自己搞，签名都很认真，发给蒋介石和毛主席的是同样的一个电报，表示不偏袒。当时是作得好的，连所有教会都动员起来了。佛教会做了三天道场，基督教、回教、天主教都举行了和平祈祷。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界成立和平促进会，并推出请愿代表鄧公复、黄墨涵、黄次咸、徐崇林、王卓然等，王卓然并被推为派赴南京的代表去到南京。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和上海的和平运动及下关惨案（二十三日上海十万人示威）配合起来了。反蒋反内战的空气澎湃全国各地。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在六月三日下停战令，并二次

延期。这就很惹起国民党对我们省委的注意。同时，即在四平街正激战之时，五月十九日，张自忠殉难纪念会在北碚开会，我作了一幅对子：“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下署“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对子拿去，布置会场的人把它挂在大会灵堂公众大对联旁很显著的地位，非常引人注意。各报，特别是国民、大公、新民等报在报道中指出：最引人注意的是这幅对子。《国民公报》还登了对子全文。这引人注意有两种解释：一是对子内容，把反对内战的意思说得沉痛；一是共产党四川省委的招牌公开拿出来了。这样一来就惹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说：“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令重庆行营查复。当时张群不在，由代理主任张笃伦于六月三日来找我，说他奉令查复此事，他说：“你们公开我们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他的意思是手续上没办好，如交涉、登记之类。他说：“该如何电复中央？”我说：“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说各党派可以正式公开，‘四项诺言’有此一条，我们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党，我们有办事处有报馆在这里，有党员，应有党的组织。第三，我们公开，就是在重庆有这个必要，其他地方无组织也不搞组织。我想，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很好，我将以此回复中央。”这番压迫无效，反而在事实上对我党之公开似乎官方已正式承认。我们就更大胆地公开活动起来了。国民党于是天天造谣，说什么“川北有匪呀”！“王维舟作匪运呀！”“王维舟匪股呀！”各特务报纸都捣起乱来，说我们要暴动呀！等等。在两次停战令满期之前，国民党加岗戒严，军警林立，要搞我们。我们很沉着的应付他们，我告诉张笃伦说：“你们要注意，我们是不暴动的，是他们（指特务）要搞，对地方上是不利的。”后来听说国民党各机关曾开会议论此事，有人提议搞掉我们，张笃伦说：“没有中央指令，不能搞。”把要搞我们的压下去了。

第二次停战令期满，六月三十日是最紧张的一天。

停战令满期，另一方面，中原战事又发动了，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第五师，李先念跑到四川边界，国民党更为恐慌，于是谣言更多，小报天天在骂我们。七月十一日，昆明李公朴被刺，十五日，闻一多又被刺，重庆空气紧张万分，民主人士很恐怖。我们很稳重，认为不把反动气焰打下去，革命的空气稳不下来，因此，非给以回答不可。决定要筹备召开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当时，各阶层的人都很不平，这个机会正好利用。恰好这时张群又来重庆，我们想如果只由民主人士和我们发起，许多人不敢参加，把张群拉来作发起人则参加的人就会多。我要邓初民和史良、鲜特生去找张群，请他作发起人和主席。当初筹备中，别人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头，我恐有阻碍大会进行，没有答应。用谁呢？谁也不恰当，张群来了就成了个好对象。史良对此很下功夫。张群当时亦不满意特务的行动，蒋要他去昆明查李闻案件，他不去，当时他要装点面子，邓、史、鲜去说了两次，张群答应了，愿作主席和发起人。再者，当时重庆国民党市党部与三青团之间爆发内讧，邓发清和刘野樵之争正闹得火热，对外不集中，我们利用了这个机会，二十八日就开了会。这次追悼大会规模盛大，对联很多（我们要争取如“四八烈士追悼会”一样热烈，是作到了的），张群、胡子昂、周炳琳、史良、邓初民和我都讲了话。因张、胡等参加，张作主席并是发起人的头名，参加的人就更自由了些，胡子昂在会上三呼“要和平”，博得热烈掌声，又因陶行知七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愤激而死，使得大会情绪更加悲愤。后来陶的追悼会开得也好，提高了革命空气。

八月十八日成都李闻追悼会，特务捣乱，打了张澜，群情愤怒，张群在重庆知道了，也生气，骂了特务一顿，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民盟要张澜去上海。双十节前，张澜到了重庆，开了个欢迎会，这会开得很好。以后，各民主人士有了定期的集会，

大家关系也很密切，各党派，各界，工商界、青年、新闻界，都更加团结得好。这时，国民党抛弃了复员军人，复员军人很不满。国民党封闭劳协^①捉人，明明是国民党以流氓军警去抢劫劳协机关财产，却反诬他们与共产党密谋暴动，大众对国民党的反动行迳都很愤激。十一月，我军撤出张家口，国民党大吹其胜利，单独下令擅自召开“国大”。民盟张澜大怒，以蒋介石破坏政协，坚决不去南京。张在重庆作用很大，常开会，我们对他的帮助也很大，使得他在民盟内部外部的声望都提高了起来，和我们更接近了。此时，苏北战事大打，我军七战七捷，鼓励了这批民主人士。十一月十二日，“国大”正延期三日就要开了，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我得中央与董老电报，要稳住邵从恩。他一到，我去看他（我和他有旧交），他告诉我：“去了也不出席国大，是要去说服蒋恢复谈判，拥护政协。”他说他有个办法去和蒋说。我对他说：“去了，不好谈，要你出席不好办了。”他说我绝不去出席。我说“他替你把名报了呢？”他表示绝不报名。我劝他稍为等等，他表示要我致电毛主席，他要给和谈尽一点力量。我应允并表示感谢，并力劝他不要去南京。张澜也劝他说：“我们同路去。”才把他留住了。“国大”一天天开得不成样子，我们的报纸和其他有些报纸都大量批评嘲笑。我和邵从恩等天天见面谈话，谈时局形势，谈蒋介石这个流氓是不能以一介书生去同他谈解决问题的办法。邵从恩是有正义感的老先生，逐渐认清了问题，决定不去，于十二月下旬回成都去了。这是开“国大”中的情形。我们揭露了“国大”的假面目，民盟坚决不动摇，把民盟的地位抬高，这是好的。张澜在重庆时，我们来往很密切，在民主人士中，我们的影响很大，一切事情没有我们的人参加就没有精神；有了我们，胆子就大了，办法也有了。育才，社大，一些民

① 中国劳动协会的简称。一九三五年成立于上海，抗战时迁来重庆。一九四九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劳协因已完成历史任务，宣告结束。——编者

主刊物，照样办起来，民主人士并未消沉下去，马哲民特地由成都来渝担任西南学院教务长，黎又霖等接办了华侨工商学院。一般的继续了政协开会期间那种工作情形。总的说来，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是作得不坏的。

十二月，伪宪法制订出来了，因为我们有以上准备，它未起任何影响，谁也瞧不起它。国民党正要庆祝伪宪，恰好北平发生美军强奸沈崇案件。三十日消息传到重庆，学生马上愤怒起来。一月六日举行了一万五千人的游行示威。规模盛大，秩序很好，是少见的。事先，国民党庆祝伪宪和放假去了，假期完毕，又不敢出面制止，只有中工^①数百人单独游行，个别地方有特务活动。当时大家都很努力，青年组^②、记者、报馆都很努力。我们做青年、学生、妇女工作的同志，以及报馆的采访都很努力，国民党不敢镇压，学运又扩大起来，利用旧历年假扩大到农村宣传，一直延到阴历正月十五（三月五日）的“反对美军暴行周。”当中以抗暴联合会为核心，把全体学生组织起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直到发生“二·五”“二·八”^③惨案，学生更加激怒，进行宣传、罢课、请愿。八日夜，孙元良来找我，口气是说，这些运动是我们搞起来的，一方面表示他已知道，并说我报鼓动风潮；一方面表示请求我们不要再搞。我表示，不是我们搞的，我们不能制止。制止是不行的。打人不是学生坏，是特务坏，把特务压下去，答应学生要求才是好办法。孙元良不得结果而去，第二天张笃伦又来，说气话，说学生逼得他受不住了，并说有我们报馆的工人参加在学生里面。他很不满，以为是

① 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简称。——编者

② 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六年南方局迁往南京后，青年组以《新华日报》服务科名义对外工作。——编者

③ 沈崇事件发生后，重庆学生相继举行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二月五日和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军、警镇压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周”宣传活动的学生，造成惨案。——编者

我们在和他们捣乱，似乎总是要搞出乱子来。并又指责我们报纸鼓动学生的言论消息太多。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想利用学生纪念去年“二·二二”反苏^①来搞我们（此事我们早就料到，以扩大延长反美暴行来抵制）。国民党中有人表示：“中央有整个计划，不要乱搞。”这所谓整个计划，恐怕就是指的后来封报馆、强迫我们撤退。对此我们也感到紧张，但沉着处理。司徒雷登发表有关我们撤退的声明，民主人士恐慌，问我们要不要撤退，我们坚决的告诉他们：“没有此事。我们是政府请来的，是合法的。除非政府明令要我们撤退，我们党中央命令我们撤退，才能撤退。司徒是外国人，管不了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更管不了我们党内的事。”过了两天，《大公报》曾敏之打电话给我，说南京有我们撤退的消息，我亦作同样表示，《大公报》登了不撤退的谈话，而未登撤退的消息。那时山东打得很好，莱芜之战歼敌五万，报纸登出来后，市面上在我贴报专栏周围围观的群众异常兴奋。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有即刻崩溃的可能。金融、实业各界表示同情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忘掉他们。自从取消新闻检查，我们报纸可以自由登载消息，天天有向人民说话及报道时局真象的机会。国民党非常恨它，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接着，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三点，国民党派出军警，把我们的报馆、机关都围起来，用武力驱逐我们。关于被迫撤退的情形，已见《解放日报》三月十五日报导和《晋绥日报》三月十七日报导，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统一战线及群众工作

多年来，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若飞等同志的领导下，重庆地区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很有基础，郭沫若等文化人也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因为国民党政府还都，大批重要人物走了，但基础

①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东北张莘夫事件发动的一次游行。——编者

还在。不久，一批新起的人物又出来了。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作得还好，尤其前方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更加提高了我党的威信。凡有什么事情，大家都要看看我们的态度，愿意我们去领导，接受我们的领导。我们去了，则成功；不去，便拿不出办法、找不出头绪。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实际上需要我们去领导，一方面是国民党太腐化、太恶劣，一般人都讨厌；一方面是我们政策、主张、行动切合国家的需要，大家的需要。使我们感到党的力量发展很大。尤其是政协以来在蒋管区的公开活动。政协会议的成功，使得进步人士，广大群众，感到只有共产党有办法，跟着我们和政协路线走，中国就有救了。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大家工作都很积极，虽然有小的错误和缺点，但大的方面是正确的，有成绩的。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有如此成绩。所以常常有人向我说：“你们共产党员讲的和作的都差不多。”又说：“你们大家都是一致的。”我党的主张、言论，在报上公开出来，使人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指南。

三、报 馆 工 作

我们在蒋管区最大的武器是报纸。《新华日报》有长久的历史和威信，尤其政协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一抬头，就开始了宣传战线的斗争，《新华日报》就成了很重要的武器。在注重国共合作的情形下，在宣传工作上，我们往往多所顾虑，反不好办；在斗争的情形下针锋相对，看谁骂得恰当痛快，反倒好办些了。尤其在取消了新闻检查之后，在言论上得到了些自由，虽然国民党用各种方法和我们斗，但我们有了报纸这个武器，每天就和他们进行激烈斗争。这主要是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指示和宣传方针，完全正确，《解放日报》的社论我们经常转载，使我们获得完全优势，使敌人抬不起头。让人民看到，我们的敌人没资格和我们交战，不论从那个方面，只是暴露了他们的恶劣。

报纸这条战线我们取得了胜利。我军前线胜利的消息天天传播，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其把我军俘虏的蒋家军官公开介绍，号召其家属朋友和他们通信，国民党感到非常之头痛。一般人和俘虏的家属，对这很感兴趣，我党的威信也大大提高。报纸反映了各阶层，工农、乡村与城市各种痛苦与斗争的消息，使穷苦受压迫的人把《新华日报》看成是他们的喉舌。反对征粮征兵，更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工商界、中小工业，我们替他们呼吁，他们把《新华日报》看成是他们的报纸。因为我们替广大群众说出了心里的话，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拥护也就有了战斗力。

《新华日报》不仅人民拥护，就是比较中立的报纸在言论上也跟着我们走。尽管《商务日报》不是我们办的，但言论和我们相合。《民主报》就更不用说了。其它如新民、国民以至大公渝版，这些报纸比较明白、开通，知道不这样作不行，不然没有人看。我们同各报馆的人也拉得很好，经常聚餐交换意见等等，作得很好。其他比较反动的报纸，也有一些好的记者或编辑在里边；除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个别特务小报外，其他各个报馆里面都有我们的朋友。有七八十人能受我们影响，成了无形的组织，经常给以教育，在一定的时机，搞签名、发宣言。《新华日报》不仅具有宣传作用，而且还有组织作用。如在各地方工作的党员和进步的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主张和时局形势，都能了解得不错，工作都能作得差不多，其原因是报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列宁说：我们的报不仅是宣传者，而是组织者。这话得到了证明。此外，我们还印了许多书刊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把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刘少奇同志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汇编而成）等，在群众中非常销得，许多退伍军人也争着买。从而报馆的力量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壮大起来。

国民党政府还都之后，最初我们估计《新华日报》要变成地方报了，作用要相对缩小，后因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都不能出版，我们在国统区只有这一张公开的日报，它又变成全国性的报纸了。蒋政府初迁南京之后，重庆各报的销数都减少一点，八至九月我报销数就陆续增加，因为他是蒋管区内我党唯一的报纸。我们把各方面的斗争都在我们报上表现出来，敌人恨死我们，天天都想封闭它。去年四月八日我们登了《驳蒋介石》那篇文章，国民党的报纸说我们侮辱元首，要想查封或捣毁报馆不成，后来又想出方法，捏造一些团体，到法院去告我们；并在柳州、开封都告。柳州法院把案子转移到出事地点重庆。我们在律师界的朋友如崔国翰等，和法院有些关系，重庆法院写了一段批文：“法律上无侮辱元首这条，如是毁谤罪，要本人起诉。”尽管国特用心狠毒，但未搞出名堂。但他们并不因此罢休，天天造谣，说什么我们要暴动！有军火！等等。用了一团人把报馆给监视起来，架起机枪对着报馆，常常殴打我们的通讯员和报丁。政协开会时，我们在重庆成立了新华社，发出稿子国民党不叫登，后来因为有打仗的胜利消息，《大公报》等就改头换面作为本馆的“南京专电”登了出来，其他如《民主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甚至《世界日报》也常常直接采用，从此新华社也慢慢地发挥了威力，公认为消息可靠，非国民党的造谣社可比。社会局好几次要想查封新华社，我们一方面请求登记批准，一方面通过私人（张笃伦）关系和当局谈，一方面自己照常发行。国民党痛骂我们“共匪吴玉章蛮不讲理……”，我们不理，还是继续工作。

去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打了报馆营业处，我们并未动摇，不怕。我们的工作同志、报丁，仍然英勇斗争，城里城外巍然屹立，继续存在，危险固然危险，大家抱着拼的决心，打就打，最多是英勇牺牲。特务和特务小报天天搞我们骂我们：“共匪头